

城市新兴职业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以北京外卖骑手为例

■ 赵 莉 王 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对北京外卖骑手的实证调查发现:在生活适应上,外卖骑手为北京高消费所困,虽能适应不佳的居住条件,但对生活现状评价不高,长期留京意愿较低;在职业适应上,外卖骑手努力达到职业要求,期待更高收入,但工作保护意识薄弱,个人发展受限,他们流入及流出该职业均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人际交往适应上,外卖骑手交际圈狭窄,休闲活动匮乏,次级社会资本数量有限且质量不高;在心理适应上,外卖骑手自身认可度偏低,个体归属感不高,多数人仅将外卖骑手的角色视为谋生的工具。整体来看,系统的职业培训、完善的帮扶计划和专业的心理辅导是提升外卖骑手社会适应水平、促进该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城市新兴职业 青年农民工 外卖骑手 社会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餐饮外卖O2O行业蓬勃发展,预计到2017年,我国餐饮外卖市场占整体餐饮消费的比例有望达到9.0%,外卖市场整体规模也将突破3000亿元。随着餐饮外卖的井喷式发展,“外卖骑手”这一新兴职业的从业人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作为传统快递职业的新分支,外卖骑手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同时“抢单型”的工作模式也加深了其不确定性,外卖骑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成为舌尖美食的传送者,社会公众也愈发意识到外卖骑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影响,对这一群体产生了高度的关注。

外卖骑手的从业者多属于青年农民工,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北京,进入外卖骑手行业,经历了生活场景和工作类型的巨大转变。目前学界更多关注和分析餐饮外卖O2O行业的运营模式,对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探究多以新闻媒体的人物专访为主,仅对其生活、工作进行简单描述,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本研究聚焦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职业群体,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生活适应、职业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方面全面研究外卖骑手的社会适应状况,同时结合理性选择、社会资本以及角色认同理论对外卖骑手各方面的

收稿日期:2016-12-30

作者简介:赵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青年农民工群体、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等;
王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农民工群体。

适应状况进行学术性和系统性的分析,探究提升外卖骑手社会适应水平的途径,为该群体健康、持续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思路

(一)概念界定

1. 外卖骑手

外卖骑手作为餐饮外卖 O2O 行业衍生出来的新兴职业,学界对其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因为大多数餐饮外卖的送餐员都是骑着摩托车或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故称这一群体为“外卖骑手”。该群体绝大多数为 18 - 35 岁的青年农民工,从业者以男性为主。作为青年农民工的新兴职业选择,外卖骑手职业承载着青年农民工职业提升和城市适应的理想。

2. 社会适应

学界在研究不同群体时,对社会适应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张海波把社会适应概念操作化为经济生存、社会交往、心理认同三个维度^[1]。本研究结合外卖骑手的自身特点,主要从生活适应、职业适应、人际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方面来研究外卖骑手的社会适应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相结合的资料收集方法,并对所收集的一手资料采用定量结合定性的方法进行分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05 份,回收问卷 101 份,有效率为 96.2% (见表 1);深度访谈外卖骑手 11 人。

表 1 问卷调查样本信息

| 项 目 | 类 别 | 频 数 | 百分比 |
|---------|------------|-----|------|
| 年 龄 | 20 岁及以下 | 5 | 5.0 |
| | 21 - 30 岁 | 64 | 64.0 |
| | 31 - 40 岁 | 25 | 25.0 |
| | 41 岁及以上 | 6 | 6.0 |
| 文 化 程 度 | 小学及以下 | 5 | 5.0 |
| | 初中 | 38 | 37.6 |
| | 高中(职业技术学校) | 50 | 49.5 |
| | 大专以上 | 8 | 7.9 |
| 籍 贯 | 河北 | 34 | 33.7 |
| | 河南 | 23 | 22.8 |
| | 山东 | 10 | 9.9 |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该群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历主要集中于初高中水平,年龄多为 21 - 30 岁的青年群体,且以河北、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人员为主。

三、研究发现

(一)生活适应

生活适应是指个体具备一定的生活条件,能够在当地社会中生活下来,适应当地的习惯。本研究主要通过调查外卖骑手客观的经济收入、居住情况以及其对现有经济水平、居住条件、生

活差异的主观感受来了解该群体的生活适应状况。

1. 收入水平在北京偏低,为北京高消费所困扰

调查发现,占 66.3% 的外卖骑手月均工资集中在 4 001 - 6 000 元,占 21.8% 的外卖骑手月均工资在 4 000 元以下,月均工资 8 000 元以上的仅占 1% (见表 2)。2015 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为 7 086 元。相较而言,外卖骑手的收入在北京处于偏低水平。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5 年北京市居民月均消费支出 2 817 元,较高的消费水平成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外卖骑手生活适应的一大障碍。

表 2 外卖骑手收入情况

| 收入水平 | 频数 | 有效百分比 |
|-----------------|-----|-------|
| 4 000 元及以下 | 22 | 21.8 |
| 4 001 - 6 000 元 | 67 | 66.3 |
| 6 001 - 8 000 元 | 11 | 10.9 |
| 8 000 元以上 | 1 | 1.0 |
| 合计 | 101 | 100.0 |

在谈及北京与家乡生活的差别时,个案 E 表示“肯定有不同的,在北京这块儿生活压力比较大,就是消费太高了”;个案 F 也提到“北京花钱多,老家花钱少。其他方面就是交通比较方便,我们那交通不太方便。这边空气没我们那儿好,我们在山里面”。从中可以看到,较高的消费水平给外卖骑手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是其适应北京生活的重大阻碍,相比之下,天气、交通等方面的困难都是外卖骑手较易克服的。

2. 以多人合租为主,居住环境简陋,流动性大

调查发现,所有 101 个调查对象均是他人合租的,其中 4 人及以上人数合租的比例达到 52.5%。多人合租的居住方式一方面能够节省开支,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居住环境简陋、居住流动性大的弊端。为了节省住房开支,许多外卖骑手会选择住在较远、条件较差的地方。个案 D 表示:“现在住在五环外面了,我们那里都是外来打工的人住,好多垃圾,治安也不好,但是便宜呀。”同时,外卖骑手的住所并不稳定,正如个案 G 所说,“现在如果房东不让你住了,你就必须搬出去,而且一起住的人如果不愿意租了,那也要重新找地方住,我们交钱都是一个月一交”。外卖骑手的住房条件虽然较为简陋,且居住不稳定,但大部分外卖骑手还能适应。就像个案 C 所言,“现在两个人合租,确实住得远,在外面,能有个屋子住,能做饭就行了”。外卖骑手群体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较低,即便居住条件不佳,他们也能较快适应。

3. 未婚者对生活现状评价更高,极少考虑长期留京

从调查数据来看(见表 3),38.1% 的外卖骑手认为现在的生活状况一般。个案 C 表示“现在只要平平淡淡地过就可以了”,而个案 F 也用“刚刚及格”来评价目前的生活状况。同时,可以发现未婚外卖骑手对生活现状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占 48.6%,高于已婚外卖骑手的这一比例,这主要是因为婚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负担,已婚外卖骑手在收入、消费和居住等方面都面临更大的压力。

对于生活现状不满意也影响着外卖骑手留京的打算。大多数外卖骑手只是将北京作为临时赚钱的地方,并未打算在北京长期发展。自身能力的缺乏和寻求安定的想法也是其不愿长期留京的因素之一。

表3 不同婚姻状况的外卖骑手对生活现状的评价

| 婚姻状况 | 非常不满意(%) | 不太满意(%) | 一般(%) | 比较满意(%) | 非常满意(%) | 样本量 |
|------|----------|---------|-------|---------|---------|-----|
| 未婚 | 5.4 | 8.1 | 37.8 | 10.8 | 37.8 | 37 |
| 已婚 | 10.9 | 12.7 | 36.4 | 20.0 | 20.0 | 55 |
| 离异 | 25.0 | 0.0 | 50.0 | 0.0 | 25.0 | 4 |
| 丧偶 | 0 | 0 | 100 | 0 | 0 | 1 |
| 合计 | 9.3 | 10.3 | 38.1 | 15.5 | 26.8 | 97 |

(二)职业适应

职业适应是指个体在从事某项工作时必须具备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特征。本研究从外卖骑手对工作的满意度、工作收获和未來工作规划等方面来研究外卖骑手的职业适应情况。

1. 外卖骑手从业时长普遍较短,该职业更强调服务

通过调查发现,外卖骑手的从业时长普遍较短,占49.0%的外卖骑手从业时长为4-12个月,有29.0%的外卖骑手从业时长在3个月以内。这主要是因为外卖骑手职业大规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同时外卖骑手的流动性较大。11个访谈对象在成为外卖骑手以前均从事过其他职业,他们之前所从事的职业与外卖骑手关联较少且种类繁多,涉及行业包括建筑、装修、厨师等。通过访谈可发现,与人交流、服务客户是外卖骑手职业与其之前所从事职业的主要区别。外卖骑手属于服务行业,因为评价、罚款等约束,面临着更高的服务要求和压力。正如个案I所言:“干厨师无非就是来了单子做菜,没那么多事情,没单子的话就歇着。干这个你得随时注意着,跟人打交道多,受气比较多,有时候能气死个人”。

整体而言,外卖骑手职业更强调服务理念,外卖骑手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也在努力调整自身以适应该职业的要求。然而,在工作中难免有一些委屈和压力,自我修复能力较好的外卖骑手能够快速恢复并吸取经验,重新投入工作中,而不懂得自我疏导的外卖骑手往往难以适应这种模式的工作,最终离开该职业。

2. 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期待更高收入

调查数据显示,外卖骑手的日均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占64.3%的外卖骑手日均工作时间为8-10小时,日均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外卖骑手占35.7%。虽然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较长,但其工作时间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通过了解发现各平台的外卖骑手会在9:30-10:00之间开晨会,晨会结束后,骑手分散接单送餐,14:00-17:00之间骑手可以休息,但休息时间不能确定,接到订单仍需派送,20:00后如果没有订单,骑手则可下班。外卖骑手对于这种弹性上班时间的态度较为一致,大部分人认为比较自由,个案C表示,“工作时间还能说得过去,我们这个属于比较自由的,比如现在没单了,你也可以休息”。除了每天的休息时间外,不同平台的外卖骑手每个月有2-4天可以休息,但绝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会选择休息,个案B谈到:“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但是很少有休息的,都想多挣钱,就算有事请假了也会加班补回来。”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每天工作时间较长是其自身的选择,他们对这种工作时间的适应度较高。外卖骑手的工资属于多劳多得类型。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外卖骑手大多对自己的工资有更高的期待,这也解释了上面提到的他们主动放弃休息的现象。个案D对目前工资并不满意:“工资的话只能维持生活,希望能够高一点”;个案H对于工资有更明确的期待,“工资低,最起码拿个6000元,现在能拿四五千块钱”。整体看来,外卖骑手对工资增长的期待属于合理范畴,他们认为自己的劳动应当获得更高的收入,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劳动来收获更丰厚的回报。

3. 劳动合同约束力较小,工作保障意识薄弱

据调查,虽然占76.8%的外卖骑手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严格履行劳动合同的比例仅占57.6%,劳动合同的约束力并不高。除了劳动合同外,外卖骑手的工作保障也并不完善。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的外卖骑手站点主要分为平台直营式和个体加盟式,平台直营式站点一般给外卖骑手上了保险,个体加盟式站点则情况各异。为外卖骑手上了保险的站点情况也各不相同。个案C表示:“他们给我们上了外地保险,没在北京上,外地保险在北京确实什么用都没有。在到家美食要工作满一年,才有北京的社保”;个案A则表示:“有保险,说的是六险,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外卖骑手对于单位是否给自己上保险一事并不在意,他们尚未认识到保险是对自己工作生活的一种保障。

4. 行业前景光明,但个人发展受限,未来规划不明确

外卖骑手大都以青年人为主,他们能够熟练上网,从而掌握一些新的行业信息,部分外卖骑手对外卖餐饮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个案B就对其所工作的到家美食的发展规划有基本的了解,“我有了解过到家这块,他们针对中高端人群,现在都是在一些大城市:上海、北京,然后可能还往别的地方发展”。个案F也对各外卖平台的发展持积极态度:“这个行业我感觉挺好的,像百度、美团,现在还有什么达达、到家都发展挺快的,这才几年啊。”

和对行业前景的积极态度不同,大多数外卖骑手对个人在该职业上的发展并不乐观,他们并未打算长期从事这一职业,而是将其当作一种过渡。正如个案A所言:“我不会长期干的,它就是一个踏板,借它的力跳出去,跳去可以挣钱的地方,最多再干三四个月。”许多外卖骑手虽然表达了想要转行的想法,但对未来却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他们大都表示:“先干着,到时候再说。”有的人想努力改变自己,但是却无从下手,正如个案J话语中的无奈:“现在努力挣钱呀,年龄也大了,想学一些东西,也不知道学什么。”在面对未来这一话题时,明显能感受到外卖骑手在工作、生活中深深的无奈和迷茫。

(三) 人际交往适应

人际交往适应是指个体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能够构建自身朋友圈子,从而满足精神需求。本研究从外卖骑手的交际群体、闲时聚会情况和交际意愿等方面来探索其人际交往适应水平。

1. 交际圈局限于同事和老乡,缺乏结识朋友的途径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4),外卖骑手的交往对象中,老乡、同事、北京本地人在5个以内的比例分别为68.8%、37.5%、82.4%,在10个以上的比例分别仅为7.5%、18.4%和2.2%。由此可见,外卖骑手的交际圈较为狭小,同事和老乡是外卖骑手的主要交往对象。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每个站点间的外卖骑手关系都比较密切,他们有自己的微信群、QQ群,有固定的休息地方。个案C表示:“主要还是和同事交往吧,大家都挺好的,遇到困难肯定先找同事,不可能找家人,家里隔得远”;个案D也谈到:“交往的主要是同事吧,老乡不多,和同事还不错,有困难的话在群里面喊一声他们就会过来帮忙,挺团结的。”同事间的关系网已经成为外卖骑手最坚实的社会支持,他们相互依靠又加固了这一关系网,然而局限于同事的关系网络也限制了外卖骑手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以及社会资源的获得,降低了外卖骑手的人际交往适应水平。

外卖骑手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从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送餐途中,休息时间不固定,这就切断了外卖骑手结识朋友的许多途径,网络成为其结交同事以外朋友的主要途径,然而这种途径往往具有虚拟性和模糊性。个案B提到:“朋友除了工作上的,一般就是微信、陌陌了吧,网上认识的一般不会出来见面,很少吧。”当通过网络也无法结识新朋友时,外卖骑手的关系网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表 4 外卖骑手交往对象类型

| 交往对象类型 | 人 数 | 频 数 | 有效百分比 |
|--------|--------|-----|-------|
| 老乡 | 5 个以内 | 64 | 68.8 |
| | 5-10 个 | 22 | 23.7 |
| | 10 个以上 | 7 | 7.5 |
| | 合计 | 93 | 100 |
| 同事 | 5 个以内 | 33 | 37.5 |
| | 5-10 个 | 30 | 34.1 |
| | 10 个以上 | 25 | 18.4 |
| | 合计 | 88 | 100 |
| 北京本地人 | 5 个以内 | 75 | 82.4 |
| | 5-10 个 | 14 | 15.4 |
| | 10 个以上 | 2 | 2.2 |
| | 合计 | 91 | 100 |

2. 娱乐活动匮乏,同事聚会成为主要休闲方式

从调查数据来看,外卖骑手参加亲朋聚会、单位聚会和社区活动的次数都较少,月均参加亲朋聚会、单位聚会、社区活动在 1 次以下的比例分别为 64.2%、82.8%、94.5%。在外卖骑手的生活中,工作是主旋律,娱乐活动的类型和次数都极少。个案 H 也表示:“我们现在工作那么忙,哪来什么娱乐活动啊,晚上忙到 9 点多下班算早的,有时忙到 10 点多。”工作成为许多外卖骑手生活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只是他们打工赚钱的地方。因为同事们的休息时间相对一致,所以聚会、打牌、聊天成为外卖骑手放松休闲的主要方式,据笔者观察,到家美食的外卖骑手常聚在南长河公园打牌娱乐。外卖骑手在北京的工作、生活不像在家乡,没有广泛的亲属关系和传统的交际渠道,虽然有较高的社会交往意愿,但因为工作时间、工作性质等客观限制,难以拓展自己的交际圈,不易适应在北京的人际交往。

(四)心理适应

心理适应包括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合理地调适情绪等。本研究通过调查外卖骑手的自身认可度、自我评价和个体归属等来了解该群体的心理适应情况。

1. 自身认可度不高,他人对该群体不甚了解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5),外卖骑手在将自己与城市同龄人做比较时,占 36.6% 的人认为城市同龄人比自己强,仅有 8.2% 的人认为城市同龄人不如自己。同时,可以发现,21-30 岁年龄段的外卖骑手认为城市同龄人强于自己的比例最高,为 41.9%,而年龄稍大的外卖骑手认为城市同龄人强于自己的比例则较低。

表 5 不同年龄段外卖骑手对城市同龄人的看法

| 年龄段 | 不如我(%) | 和我一样(%) | 强于我(%) | 样本量 |
|---------|--------|---------|--------|-----|
| 20 岁及以下 | 0 | 60.0 | 40.0 | 5 |
| 21-30 岁 | 9.7 | 48.4 | 41.9 | 63 |
| 31-40 岁 | 4.2 | 70.8 | 25.0 | 24 |
| 41 岁及以上 | 20.0 | 60.0 | 20.0 | 5 |
| 合 计 | 8.2 | 55.2 | 36.6 | 97 |

在外卖骑手的眼中,其他职业人群并未充分认识和尊重外卖骑手职业。个案 G 谈到:“反正有的人感觉送餐是个低档活。”个案 B 用一个事件说明了他眼中外卖骑手的社会地位。一个外卖骑手被车擦伤,交警判定车主全责,但车主不让骑手离开,要求其赔钱,最后交警让骑手向车主道歉。从个案 B 陈述的事件可以看出,在社会生活中,外卖骑手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应有的尊重。

2. 自我评价良好,但对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认识模糊

调查发现,外卖骑手对自我的评价较为良好,对“自己有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和毅力”“对未来持积极态度”“遇到挫折和困难能快速恢复”三项自我评价持“非常同意”态度的比例分别为 54%、61% 和 51%。然而当问及自身有什么优势时,大多数外卖骑手的认识含糊不清,许多人从未考虑过自己的优势,不清楚自己的擅长之处。同时,他们对自身劣势的认识也并不清楚。个案 F 表示:“劣势没想过,我在北京要混不下去了,就回家种地,养两头猪也行。”外卖骑手在对自己进行评价时,在宏观方面,例如实现目标、抗挫能力等都比较乐观,但是在微观方面,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能具体说明自身的优劣势。

3. 个体归属感不高,对现实的态度积极乐观

调查数据显示,外卖骑手对北京的归属感较低,认为“北京不过是我打工谋生的地方”和“我是北京的过客而已”的外卖骑手分别占 37.1% 和 20.6%,认为“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和“北京是可以实现我理想的地方”的外卖骑手占 20.6% 和 18.6%。他们人为地把自己和北京分隔开,仅仅将北京作为打工赚钱的地方。

虽然外卖骑手的个体归属感不高,但是他们对现实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个案 C 表示:“不能抱负面思想,想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把事情想清楚就没事了。”外卖骑手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有一种不服输、乐观、开朗的共性。

四、讨论与总结

(一) 理性分析

1. 理性选择与外卖骑手的职业适应

科尔曼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为基础解释广义上具有目的性的行动,行动者依据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2]。外卖骑手选择该职业,以及日后的职业规划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外卖骑手职业对从业者的学历、技能等要求较低,同时外卖骑手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劳动强度弱于建筑、装修等传统农民工职业,但收入并没有明显差距。大量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衡量这些因素后,理性地选择了这一新兴职业。然而,许多外卖骑手在对未来职业做规划时,并没有将外卖骑手职业作为长期的职业选择,而只是作为一种过渡。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外卖骑手职业后发现该职业更多的是简单且没有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缺乏晋升的空间;其次,外卖骑手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个人安全得不到保障;最后,随着外卖骑手从业者年龄的增加,他们具有安家、回乡等具体要求。在权衡了这些负面因素后,许多外卖骑手会放弃这一职业,寻找更适合的工作。

2. 社会资本与外卖骑手的人际交往适应

初始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前在迁出地就拥有的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异质”互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城市适应中作用更大^[3]。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卖骑手大多背井离乡,相较于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初级社会资本,通过后天努力而不断建构的次级社会资本,如同事、朋友等对外卖骑手人际交往适应的影响更大。同事是外卖骑手日常交往的主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同事往往是其坚实的支持者,但同事的数量和掌握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外卖骑手所拥有的初级社会资本未能对其适应北京起到明显影响,同时其所拥有的次级社会资本的数量有限且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卖骑手的人际交往适应。

3. 角色认同与外卖骑手的心理适应

角色认同通过内部和外部标准来获得,内部标准是个体确认角色并以之进行互动,外部标准包括权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一般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价^[4]。外卖骑手群体在评价自我时,表现出对自我认识的模糊,大多数人并未具体思考过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作为外卖骑手群体的一员,他们并没有明显的自豪感,而仅将外卖骑手的角色视为谋生的手段。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外卖骑手对他人的评价并不相信,在他们眼中,社会大众对自己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尊重。综合而言,外卖骑手群体的角色认同度较低,造成其在北京生活的心理落差较大,妨碍了外卖骑手群体对北京的适应。

(二) 对策与建议

1. 加强职业培训,谋求个体发展

系统而完整的职业培训有利于外卖骑手从业者在短期内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新兴职业,通晓工作流程、职业规范等,帮助其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从而提升外卖骑手对工作的适应度。许多外卖骑手都认识到了餐饮外卖 O2O 行业的光明前景,然而,他们对于自己在该行业中的发展并不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该加强对外卖骑手的职业培训,为外卖骑手的职业晋升提供条件,在餐饮外卖行业进步的同时,使外卖骑手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2. 实施帮扶计划,鼓励适应社区

外卖骑手的交际圈较为狭小,朋友多集中于同事和老乡,并且他们缺乏结识新朋友的渠道。行业协会和相关机构应该针对外卖骑手的现实情况制定和实施帮扶计划,例如联合其他职业群体定期举办体育竞赛、读书沙龙、分享会等,为外卖骑手结识新朋友提供机会;外卖骑手站点所在居委会可以将外卖骑手纳入社区服务计划中,让外卖骑手和本社区居民一起开展各种联欢活动,相互加深了解,鼓励外卖骑手适应北京的社区生活。

3. 开展心理辅导,增强自我认同

外卖骑手对自身优势和劣势认识模糊,自我认同感偏低。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外卖骑手从农村进入城市,往往会有落差感和自卑心,此时,合理的心理引导是增强其自我认同感的有效途径。工会、公益组织等应适时举办心理讲座,让外卖骑手掌握科学的自我认识方法,增强自我认同感。

[参 考 文 献]

- [1] 张海波 童 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 [2] 谢 舜 周 鸿:《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载《思想战线》,2005 年第 2 期。
- [3] 童雪敏 晋洪涛等:《农民工城市适应: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经纬》,2012 年第 5 期。
- [4] 张 宇:《论角色认同的重新定位》,载《求索》,2008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